

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3

批孔专辑

上海图书馆

毛主席语录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說 明

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为我们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指明了方向。

为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必须彻底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将分期把报刊上的有关文章汇编成册，并附参考资料和索引，供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和参攷。

上海图书馆

1974.1.

目 录

一、兩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	楊荣国 (1)
二、兩汉时代尊孔与反孔的斗争	潘 珏 (9)
三、汉代的一場儒法大论战 ——读《盐铁论》札记	康 立 (18)
四、王充和他的《论衡》	夏 潮 (27)
五、赞王充的《问孔》	曾庆瑞 (32)
索引 (1973.12——1974. 1)	

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 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

杨荣国

列宁说：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我们的取消派》）历史上唯心论哲学家鼓吹的先验论，就是当时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的“武器”和“宣传工具”，用来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是主张闭门修养，去体验所谓先验的善性，去体验所谓的天理呢；还是主张一定要感觉器官对外界事物有所接触，才能获得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心有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荀子·正名》）呢？这是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斗争。这个斗争，在中国哲学史上，是贯彻始终的。先秦时期，哲学上的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到两汉时代，哲学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又继续发展了。

两汉时代（西汉是公元前二〇六年——公元后二三年，东汉是公元二五年——二二〇年）是封建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但还存在着奴隶制残余。当时的世家豪族，大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后代，他们役使大量奴隶，进行工商业活动，有相当大的势力。如《汉书·地理志》中提到：“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横行霸道。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这些世家豪族有矛盾，对他们实行过一些抑制措施；但同时，因为剥削阶级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又和他们

相互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封建地主、世家豪族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汉武帝时，汉初诸侯分立的局面虽然结束，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从表面上看，有着进一步的巩固，但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压榨，流离失所，死亡过半，群起反抗（《汉书·夏侯胜传》）。公元前九十九年，爆发了徐敳等在山东一带的农民武装起义，他们攻克城市，夺取武器，解放罪犯，打倒和杀死官吏，震撼了当时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又见《汉书·武帝纪》）。

正是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出现了董仲舒那套反动的哲学理论。

董仲舒和《白虎通义》的先验论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年）看出先秦儒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虽然原来是为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辩护的，但只要稍稍加以改造，就完全可以用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他建议禁止其他学派活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想以强化思想统治，来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和他著的《春秋繁露》书中，宣扬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这样，就把天上的神权和地下的王权沟通起来，发挥了孟子一派“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他为了把封建秩序固定下来，提出“三纲”。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说：臣以君为纲，子以父为纲，妻以夫为纲，这些都是“天”所安排，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这就成为二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教条。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

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董仲舒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要从认识论的角度，为他这套反动的政治理论制造根据。

董仲舒发挥了孔、孟的先验论，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三种：“圣人之性”、“斗筭之性”、“中民之性”。其中只有中等人的“中民之性”，是可以通过教训、学习，渐渐变为善的。上等的“圣人之性”，那是“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繁露·深察名号》），是天生的善。至于“斗筭之性”，“斗筭”，就是卑小微贱，指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性，先天就是愚蠢的，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孔子不是辱骂这批“贱人”是卑微不足道的（“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吗？所以，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实际上就是孔子的什么“上智”和“下愚”（《论语·阳货》），什么“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那套谬论的翻版。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圣人和“斗筭之人”，一个是天生的善，一个是天生的恶；一个是绝对的聪明，一个是绝对的愚蠢。所以，一个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个就只能被压迫，被奴役。这些都是天生的，命定的，绝对不能改变的。这就是用先验论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是绝对“合理”的。

西汉末年，经过赤眉农民起义，打垮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也打击了世家豪族的势力。但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刘秀（汉光武帝）乘机攫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政权。到东汉章帝，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于公元七十九年（建初四年）在白虎观召集儒生，开了一次讨论如何解释经书的会。在这次会上，他们大肆宣扬董仲舒那套神秘的“天人合一”说和阴阳五行的迷信学说，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次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

在《白虎通义·圣人》中，将圣人说成是对于“道无所不通”的，只有圣人才有丰富的先验知识，能未卜先知，能与天神相通（“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这样一来，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就是圣人了，理由是“非圣不能受(天)命”为天子。只有这样的圣人才富有先验的知识（“独见前闻”），能“见微知著”（同上《情性》）。唯心论者所说的“见微知著”，是说：一个人的心机初动处有问题，虽然是很隐蔽、很微小的，但可以看出将来一定成为大问题。这原来就是子思（孔子的孙子，孟子的祖师）所说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的概括。意思就是说：如果内心怀有不好的动机，即使很隐蔽，很微小，好象人家不知道，但总是会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只要独自一人呆在房里，从内心的反省中进行修养，这就叫“慎独”。从此得出：人的感觉器官不必去接触外界，只要闭门修养，从心灵中体验上帝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先验的道德规范就是了。从而用以规范封建社会的秩序。董仲舒说的“王道之三纲，本之于天”的思想，就是这意思，它被进一步发挥了。这是宣扬人的认识从主观观念出发，是从主观到客观的，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至于被奴役的人民群众呢？他们没有先验的知识，是“质朴”的（《白虎通义·三教》），是不具“仁”道的（“未见于仁”，同上《辟雍》），他们只能努力生产劳动，接受统治阶级的奴役（“职在耕桑，戮力劳役”，同上《礼乐》）。劳动人民如果起来造反，就应该使之“反（返）正道”（同上《三教》）。所以它说：“礼”是专为有先验知识的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刑罚是专门设来对付没有知识的被剥削阶级的（“故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也。”同上《五刑》）。这是赤裸裸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谬论。

王充对先验论的批判

当时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的唯心论先验论进行全面有力的批判的，是以王充为代表的唯物论哲学家。

王充(约公元二十七年——七十九年)，出身于一个从事过农业和商业的平民家庭，和下层群众有过接触，受过世家豪族的压迫和欺凌。所以，他对当时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是同情的。他认识到当时农民起来造反，是由于“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争起于不足”所致(《论衡·治期篇》)。同时，他还经常和地位低下的人交朋友，比较能够实事求是地考虑和研究一些问题。他写的《论衡》这本有名的书，就是针锋相对地批判董仲舒所宣扬的那套唯心论哲学的。当时正在汉代统治者大力提倡推崇孔孟的潮流下，特别是临近王充的晚年，最高封建统治者召开白虎观会议的时候，王充在《论衡》中敢于提出“问孔”、“刺孟”，尖锐地指斥孔、孟的许多言行都是自相违背，不是实事求是，不能说都是对的(《问孔篇》)。他具有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精神。

王充对董仲舒等人所宣扬的孔、孟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他指出董仲舒的性是“纯善”的说法，是错误的，“未能得实”。又进一步批判孟子的性善说，“未为实”(《本性篇》)。王充指出：人性的善和恶，是后天逐渐造成的。正如练丝一样，用蓝色的颜料去染它，就成为青丝，用红色颜料去染它，就成为赤丝。没有经验的小孩子就象丝一样，他所以能渐渐具有善性或恶性，和用蓝色或红色颜料去染丝，使它成为青丝和赤丝，道理是一样的(《率性篇》)。这就是说，人性的善恶，是决定于后天环境的好与坏。同样的，人的聪明才能，也不是先验的，只有通过后天不断的实践才能获得。王充举手工艺为例，驳斥先验论。他

说：齐的都城世代代刺绣，那里平常的女子，没有一个不会刺绣的；襄地方传统会织锦，即使被认为不聪明的女子，也变成了巧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们天天看到，天天锻炼，手自然就熟练了，技艺就日益精巧了（《程材篇》）。所以，知识才能都不是“天赋”的。

王充指出，所谓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等等，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如果没有耳闻目见等等感觉，对于外界事物，你就什么都不知道（《实知篇》）。那里有什么先验的知识呢？

王充在《知实篇》中列举了十六件事情，说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例如：

孔子和他的学生颜渊都被匡人包围了，孔子先逃了出来，颜渊后来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被匡人杀死了”。如果孔子能先知，他应当早就知道颜渊没有被匡人杀死；既然孔子以为颜渊被匡人杀害了，可见孔子并不能先知。

孔子不愿去见阳货这个人，但是阳货送了只火腿给他，他不得不去回拜。孔子就打听到阳货不在家的时候才去，可是不凑巧，在他回来的路上刚好碰上了阳货。王充就说：如果孔子是先知的，就不会在那时去拜访，也不会在返回的途中碰上阳货。可见孔子并不能先知。

王充举的十六件事情都证明：没有所谓先验的知识，象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是“先知”。王充指出，虽然“人才有高下”，但不论怎样，你要知道事情，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学之乃知”，“不问”则“不识”（《实知篇》）。所谓“前知千岁，后知万世”，那是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

既然象孔子这样的所谓圣人，都需要学习，才能有知识，可见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人只有靠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对外界事物有所认识。

王充在否认有所谓先验知识中，除了强调必须通过感觉才能获得知识外，还指出要判断客观事物的是与非，不能单靠耳目等感觉器官（“不徒耳目”），还必须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一番（“必开心意”《薄葬篇》），才能对事物有深一层的认识。

董仲舒从唯心论出发，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就是上帝。这有意志的天——上帝，是永恒存在而不变的，所以由它的意志产生出来的“道”与“理”，也是永远不变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十足的唯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从这种反动观点出发，董仲舒认为事物的本身是没有变化发展的，先验的封建伦理道德也是永远不变的。王充则坚持变化发展的观点，指出：古代的人，没有衣服穿，现在都穿了衣服（《论衡·宣汉篇》）。可见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时代是前进的。他批判了董仲舒的形而上学观点，也批判了当时世家豪族等保守派所宣扬的“今不如昔”的观点。

后来还有一位哲学家王符（东汉和帝、安帝时人），他常和当时杰出的科学家张衡来往，深受王充唯物论思想的影响。在他写的《潜夫论》书中，从唯物论认识论的观点出发，也不承认有先验的知识，不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他说圣人不是“生而知”、“生而能”的，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其智乃博，其德乃硕（大）”。他说，犹如木制的器具一样，本来只是在山林里的木头，一定要经过木匠用墨线规划、刀斧制造，才能成为有用的器具（《潜夫论·赞学》）。人也是这样，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天才”，一定要经过锻炼和学习，才能成为有用的人。



从上看出，在当时哲学战线上，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当时哲学上斗争的重要问题之

一，就是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还是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唯物论者坚持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和经验，不存在所谓先验的知识。因此，唯物论者认为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认为时代在前进，今胜于昔，而不是倒退、反动、“今不如昔”。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则反之，他们坚持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谬论流传，毒害和欺骗人民群众。现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也是这样，他们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宣扬什么“天才”和“超天才”，宣扬什么“从主观到客观”，等等，以达到他们妄图把历史拉向后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通过学习哲学史上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唯心论先验论的反动性。这种唯心论先验论，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历史上，如孔子宣扬的唯心论先验论，是为当时崩溃中的奴隶主统治服务的；其后由董仲舒等人加以发挥，又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理论根据。学习与研究中国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加强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正如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一定要抓紧抓好路线斗争，抓紧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原载《人民日报》1973年8月13日）

两汉时代尊孔与反孔的斗争

潘 甌

在春秋战国时代，为了战胜没落奴隶主阶级，新兴的地主阶级曾依靠荀子、韩非等法家，严厉批判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但是，自刘邦窃取秦末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了“大一统”的汉代封建王朝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从尊法反儒转化为尊儒反法。他们公然宣称如能实行孔孟之道，则“功及子孙，光辉百世”；而对于法家学说，则视为邪道，力加排斥。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地主阶级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汉代，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已经过去，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他们同当时残留下来的奴隶主世家豪族的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农民阶级的反抗。地主阶级不再是一个上升的进步的阶级了。它所面临的任务是全面加强对农民的统治，而不是进行社会变革。在这种条件下，逐步转向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就抛弃了主张变革的法家思想，而采用了儒家这个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奴役。这样，在汉代，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就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是，斗争并不因此止息。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尊儒反法政策，遭到了当时的进步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的竭力反对。这主要表现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尊孔派与以杰出的唯物论者王充为代表的反孔派之间的思想斗争，表现在当时农民的革命思想对于孔孟之道的沉重打击。

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反动思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反动政策，首先是由臭名昭著的封建道统人物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前一〇四年）提出的。他认为孔孟之道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如能实行，则可称霸天下。他向汉武帝献策：一切以“孔子之术”为准则，而灭绝其他一切“异道”、“异论”，这样才能统一封建纲纪、法度，巩固政权。于是，自汉武帝起，就把孔孟之道钦定为统一的指导思想，大力加以推行。到了东汉，在钦定的《白虎通义》中，甚至荒唐地编造出神学的预言，说孔子的书为汉封建王朝立法、刘家得天下是“天”（上帝）的意志早就决定了的。汉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子加以神化，看作是他们的“素王”（无爵祿的名誉圣王）和通天教主，要人们顶礼膜拜。因而，尊孔的反动思潮一直泛滥于两汉时代。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钦定的《白虎通义》，都用“天人感应”的宗教迷信观点，把春秋战国时代儒家经籍作了牵强附会的解释，使它成为“讖纬”神学，成为麻醉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而当时的孔孟学派实际上已成了神学僧侣集团，成了直接统治人民的当权者。董仲舒继承和发挥了孔孟之道，使其为巩固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

第一，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唯心主义天道观，炮制出一套“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他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秩序都是由“天”，即神或上帝的意志所主宰的，“人”和“天”能互相“感应”，互通消息。但这里所说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而是统治阶级，主要是“天子”和“圣人”。“天子”是上帝在人世间的最高代表。这样，董仲舒就编造出所谓“君权神授”的荒谬理论，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毛主席在《矛盾

论》中曾指出：“在中国，則有所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經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阶级所拥护。”这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思想，就是董仲舒首先提出的。按照这个思想，封建统治者所推行的君主专制之“道”，地主阶级剝削、压迫人民之“道”是不可改变的。董仲舒鼓吹这种反动谬论，完全是为了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维护其封建制度的。

第二，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並把它和“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结合起来，使之更加神祕化。孔孟都否认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认为“圣人”的知识是“天”所赋予的，是通过内心修养的工夫获得的，並认为人们只要接受和效法古代“圣人”的先天知识，就可以全知一切。董仲舒把孔孟这种先验论思想，概括为“奉天而法古”之说，认为只要遵循着去做，就能“平天下”；並提出一套所谓“圣人发天意”、“聰明圣神，内视反听”等等的理论，进一步加以发挥。他认为人的全部智慧，是由于“天人感应”的结果，是“圣人”受“天”的启示之后，在自己内心中领悟到的。这样，人就不必去认识客观事物，只要从自己“本心”去感应上帝的意志——“天意”，以至于能“达(通达)天意”，就可以成为全智全能的“明圣者”。因此，他认为所谓“知识”，不过是“圣人”“发(阐发)天意”罢了。而“内视反听”也就是“圣人”“达天意”或“发天意”的途径。所谓“内视反听”就是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完全隔绝，而只“知其本心”的意思。董仲舒把它说成是“聰明圣神”的源泉。因而他就把人们从实践中获得的一切实际知识，如有关动植物的科学知识和有关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等等，一概加以鄙视和否定，认为这些都是“君子”所最厌恶的。董仲舒还把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揉合起来，提出所谓“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他认为上等的“圣人”和“帝王”有“天”所赋予的“善质”，因而是全智全能的，而劳动人民则是下等的“斗

簋(盛饭的竹器)之性”，天生愚昧无知，其品质仅仅比禽兽好一点。由此他得出一个极端反动的结论：劳动人民天生“不善”，必须承受“圣王”的教化，才能变“善”，而“圣王”是以教化万民作为他的职责的。这就把地主阶级的“圣王”对于万民的奴役和统治，说成是“天意”的安排，永远不能改变的。这正是对孔子所谓“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和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的进一步神学化。

第三，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仁”、“正名”等思想，提出“三纲五常”之说，并把它加以神学化。“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从孔子的“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发展来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也是孔子“仁”的思想的发展，孟子曾把“仁”扩充成“四端”——仁、义、礼、智。董仲舒承袭和发挥了孔孟的这些思想，并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等的神学说教，用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他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神学观点出发，认为“凡物必有合”，如阴阳、上下、左右、前后等等二者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不能互相转化，因而“君臣、父子”等等之间的关系也是固定不变，不能互相转化的。他还编造出“阳尊阴卑”的谬论，认为君、父、兄、夫等属于阳性，臣、子、弟、妇等属于阴性，前者“尊”，后者“卑”；推而论之，统治阶级属于阳性，被统治阶级属于阴性，前者“尊”后者“卑”，这些都是“天意”安排的，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董仲舒说：“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帝王所必须推行的，因为这些都是“天意”所规定的，把它实行了，劳动人民就不会造反作乱，俯首贴耳地充当驯服的牛马。毛主席在批判封建纲常时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董仲舒所鼓吹的就是这样一些极端反动的东西。

王充对儒家学说的批判

王充(约公元二十七年——九十七年)是汉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出身于“细族孤门”，是个破产地主商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教过书，曾当做过小官，后来又专门从事著述。由于他的家庭受过世家豪族的打击，自己也遭到排挤，在生活上比较接近下层人民，因此，他对当时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是同情的。王充对于先秦时代儒法两家的态度，与董仲舒之流完全不同。他赞扬商鞅等法家的“重耕战”政策，并继承了荀子、韩非等人唯物主义传统，对汉代董仲舒等尊孔派的反动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首先，王充在《问孔》这一篇战斗的檄文中举了十六件事责难孔子，揭露孔子的言论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并不是什么天经地义的“真理”。他指出当时的尊孔派迷信古代“圣人”的言论，说什么“贤圣之言皆无非”，把孔子捧上了天，是毫无道理的。在王充看来，孔子说话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往往是主观武断、横蛮无理的，例如，在《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宰予在白天睡点觉，孔子就咒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对此，王充加以评论说，白天睡觉，只是一个小过失而已，何必如此大骂，并指出：“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这岂不揭露了孔子霸气十足的丑恶嘴脸吗？尊孔派曾把孔子教出来的七十个门徒说成是个个高于今人的“殊异”之“才”，王充则认为“此言妄也”，完全是骗人的谎言。王充甚至大胆地向尊孔派提出挑战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在他看来，责难和抨击孔子及其学说，是完全合乎义理的。在《刺孟》一文中，王充揭露了孟子在理论上概念混乱，不合逻辑，是不足以作为根据的。他还痛斥当时的儒生都是即不知古又不知今的“盲瞽(瞎子)”。

其次，王充运用唯物主义天道观，有力地批判了董仲舒之流